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2.02.016

中国近代文学语言裂变新解

——邓伟专著《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评介*

黄 洁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0067)

摘 要:《分裂与建构》是一部学术含蕴深厚的好书。作者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中,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变”与“不变”、“恒变”与“裂变”有颇多参悟。该著对已成“常识”的“五·四”理念,及其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凝固范式,提出挑战。他选择“新变”作为核心术语,表达着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生态的深切关注,为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提出了新思路。

关键词:近代文学评论;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研究;新变;裂变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2)02-0100-05

《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以下简称《分裂与建构》),是一项知难而进的研究成果。著述者邓伟博士在特定的文化视野中,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变”与“不变”、“恒变”与“裂变”的玄机颇有颖悟。他选择“新变”作为核心术语,表达着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生态的深切关注,以及对于19与20世纪之交那个大转型时代中国文学语言发生激变的独到见解。

邓伟认真研究过20世纪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五四理念”,归纳出其理论思维的“中/西框架”。他认为,这一理念“规定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切入方式和一般结论,通常的看法为:五四新文学颠覆了中国古代雅文学经典作为文学语言源泉的合法性,在‘言文一致’的方向下,口语加欧化语言的倾向受到普遍的实验与肯定,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一些民间俗语和歌谣的成分,造就了五四时代文学语言的实践,进而以此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1]。这种“绝对化的描绘”,切入角度单一,思维僵化而浅表,且早已陈旧。他要对

那已成“常识”的文学理念,及其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凝固范式,提出挑战,“试图突破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文字变革和文学语言的阐释框架”^[2]。

一、“变”与“不变”的觉悟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中国从超稳定的封建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的重大历史时期。1898年的戊戌变法,一个“变”字概括出那个特殊时代的基本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组成部分,统统展示在中国人面前,并且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态文化的不同层次全面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与精神内核”^[3]。由此,“变”成为中国近代势不可挡、摧枯拉朽的历史征兆和社会力量。

这是《分裂与建构》把研究对象的时限,设立为“1898—1917”的原因。邓伟在研读浩繁的资料后发现:戊戌变法前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

* [收稿日期]2012-01-17

[作者简介]黄洁,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件。“这些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如此集中频发于这段极短的时间,充分说明中国社会与文化突破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是达到临界点后的一次总的喷发,并由此奠定清末民初时期文化与文学的基本格局”^[4]。而“以1917年为终点,是沿袭公认的看法”,即在那一年胡适、陈独秀等相继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标志“文学革命”开端的论著。自此,中国文学语言的生存与发展,进入一个远比之前的跨世纪嬗变更激进,革命的“新文化”逐渐占据社会文化高势位的新时期——“五四”运动时期。这样的时间界定与划定理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毋庸置疑,1898年戊戌变法应该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与文化精神蕴蓄突变的大爆发,对于促进近代中国文学语言嬗变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可以被确定为“临界点”背景。

戊戌变法之前,已经有不少仁人志士深切感受到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末世的衰颓气象,从而在文学领域倡导经世致用以变法。早在1815年23岁的龚自珍就在其具有远见卓识的《明良论》中疾呼:“奈何不思变法”。其后,更是热切期盼“更法”以图强,“俟踵兴者改图”^[5]。龚自珍以及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变法倡导,既为全社会的变法,也为文学的新变,积蓄着力量。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在酝酿着文学语言变革。众所周知,清代文章素以桐城派散文为正宗。然而,承袭中国古代文学的“道统”与“文统”的桐城古文,既独霸文坛之主流地位,又对于推动文学发展裹足不前,引起不少人不满意。阮元等人提出“以骈救散”,公开向其提出挑战。虽然阮元等人的理论学说遭到刘师培、章炳麟等非议,但是,作为一种挽救文学式微的积极倡导,毕竟有力地动摇了桐城派古文的统治地位,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语言朝向新时代的嬗变产生了重要作用。

1898年之后,与戊戌变法密切相关的几个重大事件,同时以政治事件与文学事件的双重身份的名义而发生,借助报刊等崭新的传播方式,震撼华夏大地。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无一不与维新派人士有关。甚至可以说,梁启超对于这“三界”革命都有发起或发动之功,由此我们

不妨说,它们归根结底就是戊戌变法在文学界获得的实绩。

由上观之,邓伟把其研究起点确定为“1898”,是一个考证确凿且深思熟虑的主意。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文学语言之“变”,既是民族文化观念的变革要求的响应,同时又体现为民族文化观念的变革实践。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文化的重任,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观念使之然。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国近代文学语言在“变”的同时,早已被规定着“不变”的宿命。

不变,即中国文学语言之“变”,无论发生在哪个时代,始终都要在以汉语言为主体,以汉语文化传统的演变为温床,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语境中讨论问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绝对不会改变的原则及其现实。不变,意味着不能用颠覆、断裂等词语描述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嬗变,意味着五四理念的“中/西框架”,试图把所谓“受到普遍的实验与肯定”的“口语加欧化语言”^①,作为发生新变的近代文学语言的两大主体性元素,并进而把此二者看作是构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系统的主体元素及结构基因,这只是一相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臆想、妄议。尤其是对于“清末民初”那个特殊时期文学语言变化的评估更是如此。

在中国学术界,有不少一直被确认为权威学说的理论,长期受到崇奉,却往往被一些证据确凿的真相“证伪”。“口语加欧化语言的倾向”是近代文学语言新变的主流或主潮,这样的所谓权威学说,大概也难以逃脱此厄运。1908年,近代小说理论家徐念慈对当时小说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精心整理出一批确凿数字统计资料,在《余之小说观》中公布。其中有一个“出人意料外”的发现: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销量,前者比后者多。“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此外,仅以1907年印数来看,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的百分比是:“著作者(即创作小说)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6]。所谓新小说即白话小说,所使用的语言当然是中国古白话加上舶来的“洋”白话;所谓创作小说是白话小说的别

① 口语加欧化语言:指近代以来中国古代白话为主体,加上翻译自西方作品的“洋经派”白话,而形成文学语言现象。

名,所谓翻译小说则大多是已经近代化或浅近化了的文言文。徐念慈的调研统计资料表明:“口语加欧化语言的倾向”并没有被当时的广大文学读者普遍接受,因而并没有促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消费市场及文学消费群体,恐怕还只是倡导白话文写作的文学革命者们自娱自乐的趣味取向,远不能说已经成为近代文学语言新变主流或主潮。

而在诗歌界,“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发行非常有限,无论是夏曾佑还是黄遵宪的所谓“新诗”,都很难证明“口语加欧化语言的倾向”已成主流。

由上可知,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新变,其实蕴藏着变与不变的玄机。不变,意味着中国文学语言无论怎么变化,都不可能改变“汉语文学”这一根本性质。因而,在汉语文学的语言系统中,硬要给“欧化语言”强行安排主体性、源泉性的地位,不符合历史事实且荒唐无稽。同时,不变,意味着中国文学语言无论怎么变化,都不可能逸出汉语文学的“道统”与“文统”,因而,不论怎样横生蔓长,最终都只能“归根”“复命”,在文言文(散文、骈文)与白话文等两大系统、三大支系中,去探寻特定时代文学语言新变的生存与发展机缘。

二、恒变与裂变之妙解

世间万物变化无穷。老子洞察宇宙之变化,曰:大道“周行而不殆”(老子(第25章))。他从哲学本体论所言之“变”,本质上属于“恒常之变”。这种变化易于把握,渐成“常识”。中国历代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对于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早已习惯于按照“常识”把握其“恒变”。刘勰《文心雕龙》专设《通变》一章,论说:“参伍因革,通变之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刘勰,文心雕龙)等道理。萧子显则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这些论述,往往都把“新”与“变”连在一起,其动机无非是强调文学的变化最终体现为革新。《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一书的题目,采取了“新变”一词,应该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继承了“恒变”的思维传统。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转型”已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倘若沿用这个术语来表述,那么“1898—1917”这个跨世纪的特殊时期,就应该

是近代中国文学探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转型期,或可以说是预谋现代转型的探索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恰好体现着文学发展“恒变”的新旧更替规律,即以文言写作为正统、主流的旧文学向急待更新话语方式的新文学转型的嬗变期。在该时期,革“新”是其原动力,趋“新”是其主导方向,创“新”是其期待的目标。正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惯性,对于中国文学语言朝向现代转型的变化,往往用“新”来给予定性。邓伟注意到了这一点,似乎也很赞成这样的定性。他引述汪晖的阐述:“就中国而言,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也是创造文化同一性的过程,……这种文化的同一性被理解为‘新’的同一性”^[7]。邓伟借此论说:“晚清以来一般书面语系统新变的时代趋势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语言世界的到来”^[8]。这些论断都沿袭着“恒变”思维传统。

邓伟的思想锋芒颇具张力。他在研究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生态的过程中,选择了“分裂”这个术语来与“新变”对应,表达着一种超越“恒变”思维的妙解旨趣。仔细辨析他所使用的“分裂”一词,其意涵颇似源出核物理学的术语“裂变”。这个术语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广为借用,指称由于社会巨变而导致多种文化思想观念或多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分道扬镳或多元化分裂,很适合用来概括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生态特征。

由于“恒变”思维的强大惯性,早就形成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等非此即彼的线性二元对立思维,并造成了一种文学研究的价值标准:在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的全过程中,以口语为根源或载体的古白话与欧化语言,是新兴的、先进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结构主体;以书面语为根源或载体的文言,是腐朽的、落后的文学语言的结构主体。用这种观念评估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学语言生态,很容易产生“你死我活”之类的妄测误判。这样的观念延续到“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欣然接受而断然实施。譬如,胡适发动“白话文运动”,其基本的思想就是:文言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的文学是活文学^[9],因此必须用白话文学史取代文言文文学史^[10]。

这种激进的文学思想对于激发中国古代文学“脱胎换骨”,促进中国文学新主流的形成,最终“使民开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

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激进的文学思想,原本是一种“片面深刻”的思想,过度推行必然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倘若冷静地检讨“五四”以来受到激进革命制约的文学思想,至少可以发现两个理论误判:一个是断裂论,一个是颠覆论。

“断裂”论是颇具迷惑性的论断。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寻根”思潮,就是以“断裂”(或“断带”)作为核心术语,掀起过一场规模不小的论争。这个带有明显的绝对意义的词语,指认一种文化的历史“断带”现象,即认为“五四”时期发动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使中国文化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文化血缘关系的中断,从而产生了一个文化的“断裂带”。有的“寻根”论者直接用“文化断裂”来表述。同时,一些当时的年轻学者认为: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主体的古代文化,惨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颠覆。本文作者曾在参与当时论争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新文化狂飙的震撼,裂痕确实出现了,但是并未断裂。即便如此,‘裂痕’也仅仅是局部的、表面的。民族文化意识的主体的、内蕴的‘断裂’,从来未曾有过”^[11]。至于“颠覆论”,更是看似无可置疑,其实比较草率而表面化的论断。

邓伟没有沿袭当年“文化寻根”论争的思维方式,而是设立“雅俗格局”的理论视野来观照中国文学语言的“裂变”。这个看似平常的观点设置,其实是很有洞察力的理论选择。作为古代书面语的文言历来是正统的文学语言,而与口语密切关联的古代白话历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议或村言野语;文言的文学是“雅”文学,文言即“雅”语;白话的文学是“俗”文学,白话即“俗”语。问题在于,“雅”文学与“俗”文学,存在不存在优与劣、新与旧以至于死与活的生存竞争?这是能不能截然断定中国文学语言是否在近、现代发生过断裂、颠覆状况的认识基点。

1903年,“小说界革命”干将狄葆贤在谈到文学“妙谛”时,论述过“雅俗”问题:“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但是他意识到,要造出“言文一致”的新文字并不容易,所以,“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12]。可见,百余年来学界的确存在关于文言与白话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的话题,但是,这不能证明文言的文学及其文言本身,就必然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生态中被淘汰而

“死”去,从而造成所谓断裂、颠覆的态势。

对此,邓伟的意识非常清醒:在清末民初这个大分化、大动荡的世纪交替时代,文学的生态“包含着犬牙交错般复杂的文学观念、雅俗定位和文化资源的纠葛”^[13]。以此而论,对于近代乃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雅俗格局”的生态演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慎重讨论、评估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世界文化理论界关于“识读能力过时论”的论争。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归纳为三个历史阶段:口头传播时期——文字(印刷)传播时期——电子传播时期。他采取了绝对的文化替代论,判定“文字(印刷)传播时期”以文字为媒介的印刷品(以书籍为主体),必然历史性地取代“口头传播时期”以口语为媒介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以此类推,电子传播时期兴起的电子媒介必然取代文字媒介,而使电视等非印刷传媒占据文化传播的主流的、统治的地位,从而导致借助书面语获取信息所必备的“识读能力”不合时宜^[14]。

麦克卢汉的论断遭到文艺评论家们“最具毁灭性的批评”^[15]。然而,他的“片面的深刻”见解,可以导出两个重要启示:其一、前电子传媒时代——人类社会的文字(印刷)时代,借助文字媒介、印刷术传播的书面语,始终以主体身份占据文化传播的主流地位。这意味着原本以口语媒介为载体的白话,要想成为文化传播主体,必须借助印刷媒介而逐渐书面化、雅化,最终与文言一样,成为必能“读书识字”的人获取信息的媒介。其二、由于印刷媒介、文字媒介的强大历史惯性,书面语作为中国文学文明化传播的媒介,一直表现出生生不息的遗传功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学要想得到“复述”或“复制”式的永久性传承,必须借助文字记载、印刷制作,才能办到,因此,世界各个民族在趋向文明的发展中,大多发明了文字以及印刷(刷)术等文化载体或工具。

这样的文化传播考察,可以为调和“断裂论”、“颠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更为逻辑周延的修改方案:白话与欧化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媒介,并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曾经以文言为媒介的书面语传统,而是自身转型为新的书面语,与谋求新生而浅近化的传统书面语一起,重构起后封建时代

的书面语生态,展开新型的文学书面语传播。

对此,邓伟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线索。

为了系统地展现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生态的真相,《分裂与建构》一书的后面部分,设定了三个章节,分别探讨梁启超、林纾、徐枕亚三人的文学语言观念及其写作实践。此三人“分别代表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中白话、古文、骈文三种潮流性倾向,其文学语言建构是具有深广文化基础的选择,是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水平与特质的真实反映”。该著希望揭示一个历史真相: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生态的建构,并不是两种不同媒介传播的文学语言“生死决斗”,一方取代或颠覆另一方,从而导致文学的书面语传统“断裂”,而是各呈风姿、共存共荣,创造了一个中国文学史前所未有的奇异风景。

梁启超、林纾、徐枕亚三个名字,可以被“视为在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实践方面的‘集体名词’”^[16],他们的文学倡导及其写作实践,具有长期被遮蔽的深远意义:对于消解中国文学语言朝向现代化的建构中语音本位与文字本位、口语与书面语、雅与俗、本土与欧化等方面的隔阂,淡化诸对立双方之间的界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此,中国文学语言的建构便一直沿着中国传统、中国特色而多种元素融合的方向发展,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表征。这是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的新思路呢?或许这样的研究更为接近历史真相。

总之,邓伟的《分裂与建构》是一部学术含蕴

New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 Language Fission at Modern Times

—Comment on Fission and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New Change of Literature Language at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Written by Deng Wei

HUANG 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Fission and Construction is a good book with deep academic information, the author had many inspirations on “change” and “without change”, “constant change” and “fis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pecific cultural viewpoint. This book challenges May Fourth Idea which is “general knowledge” and related solidified norms o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es at modern times. Deng Wei chose “new change” as core term to express his deep concern about Chinese literature language ecology at modern times and presented new ideas for modern transition of studying Chinese literature languages, whose unique academic value needs to be thoroughly studied and evaluated.

Key words: literature comment at modern time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ture language research; new change; fission

深厚的好书,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称赞,获得一些奖励,然而,才华横溢的作者勤奋的工作、聪颖的思考锤炼出的思想精华,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与评估。

[参考文献]

- [1] [2] [4] [8] [13] [16] 邓伟. 分裂与建构: 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5, 15, 12, 18.
- [3] 冯天瑜.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925-926.
- [5] 龚自珍. 尊隐[A]. 龚自珍全集(第一辑)[C].
- [6] 徐念慈. 余之小说观[J]. 小说林, 1908(9)(10).
- [7] 汪晖. 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A].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C].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1498.
- [9] 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节)[A]//胡适. 胡适说文学变迁[C].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44-46.
- [10] 胡适. 白话文学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1] 黄洁. 寻根能拓展民族文化意识吗?[J]. 当代文坛, 1986(3).
- [12] 狄葆贤.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J]. 新小说, 1903(7).
- [14]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A]//《花花公子》访谈录[A]//[加]埃里克·麦克卢汉, 弗兰克·泰格龙编, 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5] 斯坦利·巴兰, 丹尼斯·戴维斯. 大众传播理论[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97.

(责任编辑:朱德东)